

从研究经济效益到研究经济发展方式

——回忆与思考

周叔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经历过从研究经济效益到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到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周叔莲研究员历年来的研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

关键词: 周叔莲; 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K8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12) 04-0005-09

文化大革命后期, 李先念委托谷牧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一个研究组, 研究中国工业化、经济效益(当时称为经济效果)、基本建设等问题。我从经济研究所借调到这个研究组, 研究组曾到一些工矿企业调查经济效益状况, 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 研究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不过通过调查, 我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经济效益问题的严重性。粉碎“四人帮”后, 我和研究组同志认真研究了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问题。后来我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 又长期参加了经济效益的研究工作。经济效益问题后来延伸和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我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写过若干篇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经历过从研究经济效益到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到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我以上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

一、研究中国经济效益差的原因和对策

1979年中国进入了经济调整时期,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要求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根据这个要求, 从1979年到九十年代前半期, 我研究经济效益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我和谭克文、林森木合作写了多篇研究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效果的文章。主要有:《基建战线过长的为什么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基建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在哪里》(《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论提高投资效果》(《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争取经济工作的主导权》(《红旗》1981年第3期)。我们提出: 长期以来, 中国基本建设效果很差, 花钱多, 办事少, 损失浪费严重。我们经常讲基本建设战线长, 财力、物力、人力使用分散, 管理混乱, 但这种“专、散、乱”只是表现形式, 投资效果差才是问题的实质。投资效

收稿日期: 2012-05-26

作者简介: 周叔莲(1929-),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果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能够提供的物力和财力,致使不少建设项目打打停停,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投资规模过大的症结要从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中去寻找。中国现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用前苏联五十年代初期的办法,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有争项目、争投资、争材料设备的积极性,没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和责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规模比较小,问题还不突出,以后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在这种体制下,搞好基本建设的综合平衡是很困难的。要解决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提高投资效益,一定要搞好综合平衡,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使得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能关心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效果。后来,我在《基本建设规模和社会经济机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4期)中分析了影响基本建设规模的多方面原因,指出“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建立能够保证基本建设规模合适的社会经济机制。”这不仅要从小经济领域着眼,而且要从整个社会领域着眼,从经济管理体制、国民经济体制、经济杠杆、行政干预制度、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经济信息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等多方面创造条件,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都具备强大的动力和经受必要的压力,能够自觉地关心基本建设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果,实现基本建设规模的合理化和投资效果的最优化。

2. 研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1981年我在《工业生产要讲求经济效益》(载《经济效益问题广播讲座》)中分析了中国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及其原因和出路。当时,工业经济效益差的主要表现是:生产中消耗大,浪费严重;产品质量差,有的甚至是废品;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企业利润率下降。文章指出:虽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由于经济效益差,实际的社会财富没有相应增加,人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从1950年到197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4%,国民收入年均只增长7.3%,1958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6.3%,每个人的消费水平每年只增长2.8%,职工的实际工资甚至还有下降。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只重视工业发展速度,忽视了经济效益,这样做就带来了工业挤农业、重工业挤轻工业、基本建设挤生产维修、积累挤消费等一系列问题,表明盲目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度必然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从而破坏合理的经济结构,导致经济效益下降。这当然不是说工业发展速度越慢越好,事实表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难以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但确定工业发展速度要看到它受资金、能源、原材料、市场等多方面的限制。过去那条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多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要认真研究如何在当前条件下做到投资和积累不那么多、速度不那么快、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办法,走出一条依靠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工业的新路子来。后来,我又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人民日报》1982年4月2日)中提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一是消耗高、质量差、亏损大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二是整顿现有企业,三是改善经营管理,四是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设备的技术改造,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指出:我们要想方设法把现有工业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由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过去工业基础薄弱,必须主要依靠新建来扩大再生产,现在工业有了相当的基础,今后发展工业则应主要依靠内含扩大再生产。八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治理整顿,我发表文章指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要正确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有些人认为治理整顿就是“不要改革”,就是“回归旧体制”,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治理整顿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物资管理体制、计划体制改革等方面深化和完善,努力扭转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1]

3. 研究工业中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长远经济效益和目前经济效益的关系。我指出,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要处理好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益是相对的概念,这里主要是指整个工业部门经济效益和个别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果的基础,只有微观经济效益提高了,宏观经济效果才能提高。但是,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果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那些盲目生产、盲目建设的企业,从本单位看可能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但

是由于破坏了国家计划，和其他企业抢原材料和能源，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从整个社会看是不利的。每个企业和单位在努力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定要关心宏观经济效益，使微观经济效益服从于宏观经济效益。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还要处理好长期经济效益和目前经济效益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既要改善目前的经济效益，又要改善长远的经济效益，既要为人民当前的利益着想，又要为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目前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也会出现矛盾，必须正确处理这种矛盾，把长远经济效益和目前经济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工业生产要讲求经济效益》）

4. 研究经济效益低和经济效益下降的区别以及影响它们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我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中指出：在分析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时，应该弄清经济效益低和经济效益下降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经济效益低是指一个时点上经济效益的状况，经济效益下降则是指经济效益的动态变化状况。某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的经济效益低，但如果影响经济效益的诸多因素有所改进，则在以后另一个时点上的经济效益将有可能提高，尽管其经济效益比其他国家仍然要低。经济效益下降常常是由于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些主要因素不仅没有改进，而且趋于恶化的结果。我还指出：在分析经济效益的动态变化时，还应分清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我把自然条件、生产力状况、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管理水平等称为客观因素，把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人的主动性等称为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变动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导致经济效益提高，一种是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同客观因素相比，主观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客观因素不仅变化较慢，而且它的变化方向和速度也常常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

5. 研究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有人提出国民收入也可以和应该翻两番，主张国民收入要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但也有人认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也不必要同步增长。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主要是以工农业总产值衡量的，研究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就是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马洪让我研究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我写了《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湖南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再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年第3期）、《税利要和生产同步增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年第1期）等论文。当时，有人认为工农业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尤其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会上升，因而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比重会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不可能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我对这种意见作了分析和辩驳，认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同步增长的。我列举了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一段时期内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史实，还列举了中国1952年、1953年、1955年、1963年、1966年、1978年、1981年国民收入也大体是与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有的年份甚至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史实。我指出，中国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又是相当困难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慢很多，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盲目追求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要按照走经济建设新路子的要求，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一点，使它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一是努力减少物资消耗，克服普遍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二是完善产业结构，真正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处理好工业内部结构，使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有较快的发展；三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四是合理积累和充分利用资金；五是提高产品加工深度；六是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技术改造首先要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七是提高企业素质；八是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

二、从研究提高经济效益到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九五”计划时期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延续和发

展,从这以后,我对经济效益的研究转向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5年11月,国务院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写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困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改革》系列文章,以《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问题》为总题目,作为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发表在《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28-29期)等刊物上。论文试图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什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生产要素可分为劳动和资本(土地一般被包括在资本中),现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还包括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而生产要素如何组合、如何使用,需要研究。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为了产出,投入要素的组合和使用对产出有很大影响,要很好地把生产要素组合和使用,使产出增加。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素质和资本的质量;二是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发展趋势是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三是改进生产要素的配置;四是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

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标志很多,包括技术进步、质量提高、效益提高和效率提高,还有总量标志即经济增长速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效率就是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即单位投入的产出量。现在我国的情况是投入多产出少,单位投入产出量的增长率(或者叫综合(全)要素生产率)低。改革以来,中国的投入效率是增加的。有人计算,1953~1978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6%,劳动贡献率为23.7%,资本贡献率为69.6%,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6.7%。1979~1993年年均增长率为9.2%,劳动贡献率为16.6%,资本贡献率为58.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增加到25%,这说明投入效率是增加的。但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投入效率仍然很低,还处于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经营阶段,必须实现向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达到50%,才算达到转变第一步目标的要求。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多年来强调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精神是一致的。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时期,即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主的时期。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提高经济效益也是可能的。但在集约经营阶段,提高经济效益的地位、作用、要求和措施都会不同。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长远奋斗目标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包括节约资源、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等要求。我们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

5.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现代经济增长,而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不断进步基础上的集约型增长。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期实行粗放式、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免的。不过,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要转变为集约式、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增长率,即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会增加,科学技术的贡献会增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包括管理)。中国改革以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平均为25%,1991~1993年平均为33.1%,低于发达国家五十年代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还很低,还没有走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轨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概括起来,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1)现在这样的高速度,由于投入多,产出少,付出的代价太大。如果不改变粗放的经营状况,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是很困难的。(2)在粗放经营条件下力争高速度,难免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3)中国产业结构面临着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任务,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有走集约经营的道路,才能达到这一目的。(4)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要多产出,又不破坏资源和环境,也只能走集约经营的道路。(5)中国要扩大对

外开放,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6)实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6.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即使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未必能实现这种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少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产业结构能适应集约型增长的要求;二是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水平,进步较快;三是重视经营管理和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四是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五是经济体制有利于实现集约型增长;六是政府实行促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我认为中国基本上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一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合理的地区布局已经展开,并正在完善之中;二是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已引进了几万项先进技术,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技术基础;三是经过长期的管理实践,积累了经验教训,培养了一支经营管理队伍,不少企业已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培养了一支有觉悟、有能力、有技术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在不断扩大,水平在逐步提高;五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一部分国有企业已具备活力;六是经过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针,制定了必要的政策。

7.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尽管中国已基本上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但是有些条件需要完善,同时面临着很多困难。(1)国有企业还未普遍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竞争主体,困难很多,缺乏活力,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托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乡镇企业虽然异军突起,但由于起步晚,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先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不少困难。(2)还没有形成促进科技进步并尽快使高科技产业化的社会经济机制,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3)企业管理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中国还处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还未完全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4)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粗放经营的惯性依然存在。在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可能性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转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充分利用已具备的条件,积极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要充实和完善各种条件,克服各种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8. 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注意的问题。(1)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现在还有盲目追求速度的机制和条件,而速度过高必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2)重视企业技术改造。中国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可以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增加生产的,就不要铺新摊子。技术改造效益高,投资省,进度快。(3)重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关系到生产要素能否有效地组合和使用,不抓好企业管理,就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4)努力节约。现在浪费成风,这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要位置。(5)加快改革步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关键在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科技进步、管理进步、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都要求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6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深化改革”的书面发言。后来,我又发表了《实现“纲要”,要把两个转变结合起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实现“两个转变”作为指导思想》(周叔莲:《中国经济的两个转变》)、《企业家要在“两个转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周叔莲集》)等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文。

三、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们在学习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两种提法是什么关系?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大”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在《对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61期,2007年12月10日)中认为这种意见不够确切。我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包括经济增长

方式的内容,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按照上述这种意见,似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失效了,不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了。而事实上,中国仍面临着艰巨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不过它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其他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确切地说,从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用一种提法替代另一种提法,而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发展。

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呢?我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内容比较明确,它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的变化,包括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模式。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则比较丰富复杂,其全部内容和体系结构尚待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它除了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还包括产业结构、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要求从通常的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专门学科。有很多经济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时,超出了经济增长含义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写过《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的经济增长》两部著作,他根据对一些国家长期统计资料的分析,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三是经济结构急剧变动;四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变化;五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也早就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产的规模化,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及生活环境改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把它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是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认识的结果。党中央不仅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也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以后,党的“十五大”又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又根据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等战略思想。这样,“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自然而然了。

我认为,“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认识和理解:(1)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上升,总的说经济形势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些是原来就存在的,但现在尖锐化了;有些是新出现的问题。例如,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资源消耗和资源供给的压力明显加大;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由于积累消费比例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制约着经济健康发展;国际贸易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盈余过多。此外,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也趋于突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不是单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能解决的,需要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设法解决。(2)就经济增长方式论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生产要素结构优化,质量提高,达到节约资源、增加产出的目的,这势必涉及经济发展方式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单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3)经济发展方式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经济增长方式涉及的主要是生产,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系统。提出和研究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理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领域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从而也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4)经济发展还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

需要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配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人们更重视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更有利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促进，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重要问题

近几年，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重视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有：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发展观念。2008年，有关部门对“十一五”规划实施进行中期评估，发现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些重要任务却未能完成，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此困难？我认为，传统发展观念还在发挥作用是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观念。我指出，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传统发展观念的核心，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转变盲目追求高速度的观念。过去追求发展速度主要表现为追求工农业总产值，现在主要表现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两者有所不同，但经济上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种种恶果，这一点是相同的。总结建国60年的经验教训，完全有根据说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一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三不利于建立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四不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五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六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这样也就难以顺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已经具备转变发展观念的有利条件。最有利的条件是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就是把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观念，转变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并贯彻落实在实践中。我指出：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会遇到一些思想理论问题，需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开展讨论，加以解决。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快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速度越快越好。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确实需要一定的发展速度，但是就业多少不仅决定于速度快慢，还决定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企业规模结构和有关的各种政策。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理由追求过高的速度，不一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而且会带来种种恶果，最终也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速度快，生产增加了，才能实现公平分配。事实上，生产和分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生产发展使蛋糕增大，可能有利于公平分配，但并不会自动导致公平分配，而中国近十多年来的情况是，生产发展了，各种收入差距反而不合理地更加扩大了。所以，这个观点也不能成为追求过高速度的理由。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要担忧资源短缺，只要价格由市场机制即由竞争决定，资源问题就能够解决。现在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不合理，确是导致资源供给和使用问题的重要原因，价格机制和定价的合理化会有助于解决资源问题。但是，不能认为可以不顾资源供给状况确定发展速度。地球上的很多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即使科技进步可以找到有些资源的替代品，也有一个时间接续问题。何况有些资源不一定会进入市场。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规律。从历史看，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确实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现在我们不能再走这条道路了。因为这条道路代价太大，而且地球的生态环境已到了恶化的顶点，不容许再增加污染了。这条道路不仅对不起子孙后代，也使当代人受困于污染的化境，甚至使他们喝不到干净的水和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从而难以有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这些观点进行研究讨论，辨明是非，克服各种片面性，转变发展观念。^[2]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深化体制改革。我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还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不仅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现代化需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个建设都有改革的问题，也都有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因此，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指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未来十年要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根据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处理所有制问题。公有制并非就是社会主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有制经济也未必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制经济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办事，这种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现象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形成能够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必须结合，也可能结合，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要从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要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影响政治文明建设，延缓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是权钱交易、官商结合、寻租、腐败等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要努力完成党的“十七大”规定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奋斗目标，从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前应该着力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代政治体制改革。不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搞不好的。经济学界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有一种规避政治体制改革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是不能脱离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长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更不能脱离政治研究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艰难和有风险的，而且会遇到阻力，特别是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正如党的“十七大”所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困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和条件。

3. 研究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不关系，提出加快城市化绝不能放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举措。因此，需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是，加快城市化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包括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加快城市化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城市化脱离了经济发展，城市化也难以健康发展。二是加快城市化需要什么条件？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三是加快城市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加快城市化要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人认为，推进城镇化就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似乎城市化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了。我认为，加快城市化不能代替新农村建设。一定要破除轻视农业、农村、农民的看法，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推进城市化不是要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而是要为建设新农村创造条件。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我们要想方设法让人们既热爱城市，也热爱农村，不能把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推进城市化要稳中求进，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城市化率要达到多少才算完成城市化，也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照抄照搬外国。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也是有扩大产业和增加就业的潜力的。中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产前、产中、产后都有增加就业的机会。同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化农业相联系，许多服务业需要发展，也一定可以发展起来。农民也应该和可以通过学习、培训等渠道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来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化农业过程中，要发扬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向生产的广度、深度进军，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现有13亿人口，将来可能会达到15亿，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必须基本立足国内。农业和农村必须保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壮劳动力进城，老弱妇女留在农村，要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是不可想象的。与建设新农村的声音相比，现在加快城市化的声音太高。如果因此而放松了新农村的建设，那将犯绝大的错误。（《扎扎

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4月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座谈会上的发言，部分内容载《中国宏观经济学会通讯》第15期。）

4. 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生产和消费是什么关系？谁是目的，谁是手段，谁服从谁？需要研究。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一种情况是生产是目的，消费是手段；一种情况是生产和消费互为目的和手段。从历史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里，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是目的，消费是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生产因此成了目的，社会为生产而生产，消费成了手段，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形成了消费社会。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而消费又成了目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发的条件下，我们明确消费是目的并不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观念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它至少提出了以下几项重要任务。一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消费观。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要研究、建立和倡导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而又可行的消费模式。三是要从这种消费模式出发，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要求，因为消费既是生产的终点，也是再生产的起点。四是努力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观念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

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消费不足和消费过度两种现象。全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几亿人还不富足，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但是也存在过度消费、不健康消费、有害消费的现象。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向欧美高消费学习和看齐的趋向，这不符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和现实的经济 development 情况，也不符合未来发展的要求，需要倡导科学的符合小康社会的消费观念，建立和推广健康、幸福、可持续的消费模式。^[3]

5. 建议“十二五”规划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在2010年4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十二五”规划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举出四条理由：第一，这是适应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的需要，因为不可能再走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路子，出口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旺盛。第二，这是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三，有连续性，易于理解和贯彻。很长一段时间宣传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要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资源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第四，可以带动社会发展方式、政治发展方式、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内外有人主张中国要以消费为主导，建立一个消费大国。现在消费率过低，针对这个情况，强调消费，提高消费率，是必要的。主张以消费为主导则要考虑几个问题：一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不生产就不可能消费。二是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那样实行高消费。三是即使我们生产发达之后，也不应建立像欧美国家那样的消费社会。四是“十七大”提出了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提法比较科学、灵活。从人口角度来讲，我们已经是消费大国，但是高消费还做不到，只能是一个小康水平。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是为了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是为了追求特别高的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一个痼疾。不克服这个痼疾，就难以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4]

参考文献：

[1] 周叔莲.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J]. 经济管理, 1990, (2).

[2] 周叔莲.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J]. 新视野, 2010, (3).

[3] 周叔莲. 宁可慢些, 但要好些——关于正确处理当前经济发展中几对关系的认识[N]. 学习时报, 2010-05-03.

[4] 周叔莲. “十二五”规划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Z].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通讯, 2010, (19).

(责任编辑：范根祥)